

马克思主义学校的党史教育

中央苏区时期

冯兵钟以瑞

中央苏区时期，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的前身），大力培养训练党员干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党史教育。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党史教育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特色，锻造了一批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苏维埃革命斗争提供了基干力量。

进行党史教育是发挥党校熔炉作用的重要途径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党多次作出在苏区创办党校的指示，注重发挥党校的熔炉作用，对苏区党员干部进行党史教育。1931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要求“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同年11月，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正式建立苏区中央局党校，校长由任弼时兼任。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苏维埃党校定名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于瑞金洋溪正式开学，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所中央高级党校成立。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成立时分设三类训练班：一是专门培养新苏区（含白区）工作人员的训练班，学制2个月；二是学制4个月的训练班，分党、团、苏维埃、工会4个班；三是面向各省委、省苏维埃和省工会派送的高级干部训练班，学制6个月。各班学习科目不尽相同，据党校学员回忆，主要以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苏维埃运动史为主。党史课程多由党的领导人主讲，毛泽东讲苏维埃运动史，任弼时和邓颖超讲党的历史，陈云讲中国职工运动史，顾作霖讲少共史。由此可见党史教育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鲜明特色

1933年3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副校长董必武在开学典礼上宣布：学校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展的党史教育体现了理论

联系实际的鲜明特色。一是党史教育始终围绕中国革命实际开展。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时常邀请有着丰富理论素养和实际斗争经验的革命领导人讲授党史。毛泽东讲授中国苏维埃运动史时，首先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1927年以来的革命斗争历程，引导学员领会“由于我们的国情和别国不同，革命道理也就不完全相同”，中国革命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学员们听了党史课后受益匪浅，普遍反映“毛主席讲的都是我们切身关心的革命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既有马列主义理论，又有中国革命实际”。

二是党史教育符合学员实际情况。革命战争年代，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党史教育往往采取生动具体、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用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典型事例说明党史的学理和价值，使学员能够轻松理解。党校学员称赞毛泽东讲授的党史课“通俗易懂，摆事实讲道理，越听心里越亮堂”。董必武讲授的党史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在讲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时，通过在黑板上画一个火车头，启发学生深刻认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先锋队好比火车头，党的先锋队作用就像火车头带动列车前进。在学员看来，这种贴合自身实际的党史教学，“有群众语言、有实际例子、有生动的比喻，不但容易听懂，而且记得牢”。学员因此对党史产生了浓厚兴趣，极大提高了党史教育的实效性。

三是党史教育注重实践培养。除在课堂上讲授党史理论知识之外，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还拓宽了党史教育的实践渠道，多次组织学员深入附近乡村作调查宣传和义务劳动，帮助群众挑水砍柴、送肥浇菜、插秧割稻。学员肖锋清楚记得，每当课间休息时，同学们都卷起袖子，挽起裤腿，打起赤脚，下田同当地老表们一道犁地、担粪、插秧，个个都是劳动能手。通过深入的社会实践，学员与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加深了党史记忆，真正做到将党史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这种极具特色的党史教育模式，对之后开展党史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锻造了一批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1933年3月学校创办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学校被迫三次迁校。270多名学员曾聚集在一间稻草盖顶、泥巴粉墙的木质结构教室中学习。即便如此，学校的党史教育仍然培养了一大批信仰坚定的党员干部。

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学员建构起对党史的集体记忆，树立了正确的党史观。任弼时在党史课上详细介绍了党的一大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阐述了党诞生的国内外历史条件以及毛泽东、李大钊等同志为建党作出的突出贡献，为学员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有学员听后表示“很有味道”，感叹“当了六年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还不知道共产党是怎样成立的。现在可找到根源了”。邓颖超在给高级班学员讲党的历史时，讲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使学员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复杂性有了清晰的认识，能够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

通过党史教育，筑牢了对共产主义的革命信仰。学习结束后，学员刘俊秀说：“我的理论水平得到提高，思想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初步确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人生观；觉悟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由此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产生了高度的信仰。”学员谭启龙在他的回忆录中称，通过学习，思想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明白了革命的目的，自己真正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

接受党史教育后，学员更加自觉拥护党的政治主张。例如，学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购买公债、节约粮食、扩红动员、拥军支前等工作中取得了优异成绩。《红色中华》报道称：1933年8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青年团班的学员为了开展经济动员支持革命战争，主动开会报名预先购买公债，会议不满30分钟，报名人数有大洋22元，另有15元捐作革命战争经费。学员热烈拥护党的政治主张，充分说明苏区党员干部经过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党史学习教育，多数锻造成为了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用行动筑牢崇高信仰、用鲜血写就不朽史诗，推动着苏维埃革命洪流滚滚向前。

血染的半塔 英勇的铁军

——半塔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田翼然

半塔烈士纪念碑位于安徽省来安县半塔镇。1940年3月，新四军在这里抗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万余人的进攻，取得了半塔保卫战的胜利。为纪念半塔保卫战及在抗日、反顽斗争中牺牲的烈士，1944年3月，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罗炳辉领导半塔烈士纪念碑的建造工作。后因新四军战略转移，半塔烈士纪念碑建到一半停工。1958年，来安县政府续建半塔烈士纪念馆，并依山而建烈士陵园。纪念碑前立有半塔烈士纪念碑，上刻张云逸大将1964年撰写的《半塔烈士纪念碑记》，全文如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进攻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国人民并与国民党合作，进行抗战。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中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顽固派在日寇诱降下，亦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向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猖狂进攻。

一九四〇年三月，安徽省国民党顽军李品仙部，配合日寇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大桥地区进犯。与此同时，江苏省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以十团之众，向我五支队后方半塔地区大举进攻，妄图趁我第四、第五支队和游击纵队主力在津浦路西反击日、顽军之际，一举歼灭我江北部队。此时，我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同志和第五支队副司令员周骏鸣同志在路东指挥第五支队教导大队四百余人固守半塔集，并以一个营及地方游击队袭击顽军侧背，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苦战十昼夜，击退了顽军多次进攻，半塔阵地，屹立不动。直到路西我军大捷，我和副指挥罗炳辉同志，按照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兼程回师路东，迂回攻敌之后，叶飞、陶勇两同志奉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员陈毅同志命令率在江北部队赶来驰援，半塔守备部队亦乘机出击，敌被我军三面夹击，伤亡惨重，乃仓惶溃退。我军乘胜追击至淮河南岸，俘获甚多，胜利结束这一战役。

这次战役，在刘少奇同志的指挥下和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援下，军民团结一致，英勇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仅奠定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且对华中抗战全局关系至为重大。

安徽省来安县人民为纪念半塔战役与在抗日反顽斗争中光荣牺牲同志们的卓越贡献，援（爱）建此碑，以铭不朽。我当时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员，曾参与此役，目击革命烈士们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备详史实，谨为之记。

张云逸
一九六四年五月一日

碑文以翔实的语言叙述了半塔保卫战的背景、过程及历史意义，表达了对革命烈士由衷的崇敬与深切的缅怀，读之令人动容不已，肃然起敬。

（一）

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力部队分成许多支队，向敌人后方挺进，发展和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创建了若干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1939年秋，以罗炳辉为司令员的新四军第五支队，东进皖东敌后，开辟了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打开了淮南路东敌后抗战局面。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反共磨擦中遭到严重挫败后，便将磨擦中心移至华中，企图隔断我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以达到各个消灭的目的。蒋介石命令第3、第5战区和鲁苏战区的部队大举进攻华中地区的新四军。1940年3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乘第5支队主力西援津浦铁路以西之机，调集第117师、独立第6旅及地方保安旅、团等共1万余人，向来安县半塔及附近地区发动全面进攻。

第5支队留守半塔及附近地区仅

有后方机关、教导大队等，共2000余人，且新战士较多，武器装备差。半塔局势危急，刘少奇当即命令，留守半塔的邓子恢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持在半塔集，待路西主力军挥戈东援再歼灭韩顽；并以中共中央中原局名义发布告同志书：号召同志们忍受一切困难，为粉碎顽固派的进攻而流尽最后一滴血。

（二）

3月21日凌晨，顽军第117师的第697团为第一梯队，第698团为第二梯队，从半塔集的东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突然发起进攻。在邓子恢的指挥下，驻守半塔的第5支队教导大队发扬顽强作战精神，一天之内打退顽军3次进攻。3月22日，围攻半塔集主阵地的顽军继续从东、北两个方向发起数次进攻，均被击退。

与此同时，顽军独立第6旅第13、16团各一部和六合县常备队约2000人，向驻竹镇的第5支队第15团的两个连发起攻击，第15团参谋长胡定千率部与顽军激战6小时，后退至石涧子设防，又遭顽军重兵攻击，伤亡重大。

顽军占领竹镇后，独立第6旅第18团向半塔进击时，路经乔王，遭新四军游击队顽强阻击。这支40余人的游击队，在民运工作组组长兼游击队长、指导员刘洁（女）的带领下，凭借坚固工事，与顽军激战一昼夜，牵制顽军一个团的兵力。3月24日上午，该部顽军被迫绕道进击半塔。

3月23日，奉陈毅命令，新四军挺进纵队副司令员叶飞率挺进纵队第1、2团各两个营和特务营，从江都吴桥镇出发，西渡京杭运河，穿越天（长）扬（州）公路，昼夜兼程，驰援半塔。叶飞部在增援半塔途中，4天打了3个胜仗。3月26日，叶飞部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五颗星

李 华

党的领导力量。同年12月4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漳州成立，王海萍被选为省委执行委员，任省委宣传部长。此后王海萍又先后担任过闽西暴动总指挥、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等职，为福建党组织和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作出了杰出贡献。到1929年底，福建全省已有20多个县建立起党的组织，党员约3000名。在这一年秋季，梁惠贞经党组织批准，离开上海南下福建，来到设在厦门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工作。根据革命需要，省委决定由她负责省委政治交通，往来于厦门与上海之间。

王海萍与梁惠贞是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和模范夫妻。他们在工作上互相勉励，在生活上互相关照，日子过得美满充实。在艰苦严峻的革命斗争中，梁惠贞不顾得了结核性肠炎的身体忘我的工作，同敌人开展英勇斗争。1930年5月25日，福建省委在厦门组织武装劫狱，机智勇敢地救出因在狱中的30多位革命同志。王海萍就是当时领导震撼全国的“厦门大劫狱”破狱委员会的5个成员之一。

真英雄无悔大爱在人间。1931年1月福建省委书记罗明调往上海党中央另行分配工作，王海萍接任他的职务，领导福建各地的农民武装斗争不断发展。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很牵挂已经怀孕的妻子，夫妻二人非常期待即将出生的孩子。梁惠贞拒绝了组织照顾，她以孕妇的身份可以更好地掩护自己完成任务为由，继续坚守在工作的前线。

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派遣军警、特



占领马集一线。

为转变战局，韩德勤于3月24日晚又增调常备第10旅前来支援，连同阵地之顽军共约2000余人，于次日再次向半塔主阵地发起攻击。在新四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顽军士气低落，加之连日进攻失利，愈战愈怯，逐渐失去战斗意志，而新四军指战员则是愈战愈勇，士气高昂。战至3月27日，在根据地群众、自卫队紧密配合下，第5支队后方机关和留守部队共击退顽军10余次进攻，坚守主阵地达7昼夜。此时，第5支队主力东返，在增援的苏皖支队、挺进纵队和第4支队第7团配合下，向围攻半塔的顽军大举反击。在三面夹击下，顽军伤亡甚众，仓惶后撤。

半塔保卫战，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为建立淮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五颗星

务，搜捕共产党的地下人员，破坏党的组织，疯狂地镇压革命活动。1931年3月25日由于叛徒出卖，福建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梁惠贞和其他几位同志被捕。敌人对梁惠贞说，只要你招供，就可以保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平安。是出卖同志背叛革命换取自己 and 孩子的生存？还是为解放劳苦大众推翻这个黑暗的旧中国而牺牲？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做出了毅然的选择。5月1日凌晨，梁惠贞即将被敌人枪决。临刑前，梁惠贞说：“我的爱人对我说痛快才是人生。死也要痛快的死，为着信仰而牺牲是如愿以偿了！”为了保护孩子，她取下手表递给刽子手，请求别打肚子里的孩子。刽子手接过手表对着梁惠贞的头部连开两枪，梁惠贞带着未出生的孩子倒在血泊中。

在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的当天下午5点半，王海萍强忍悲痛向“中央转罗明”汇报了情况。他在报告中说：“一批忠实的同伴如此离开了，在艰苦工作过程中不能再见他们了。明兄我哭了！”又说：“自然我绝不怕困难的，不因此悲痛消极只有再接再厉的前进，为同伴们算个总账。”梁惠贞牺牲后，王海萍继续领导厦门、漳州、泉州等闽南地区的革命斗争。1932年7月，由于叛徒出卖，王海萍在厦门中山公园被捕后光荣牺牲，年仅28岁。

